

【论 文】

## 费孝通先生在内蒙古的调查研究工作<sup>1</sup>

潘乃谷

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内蒙畜牧兽医学院（后改名内蒙农牧学院，今称内蒙古农业大学）工作，当时正是由我们这样一群刚刚毕业不久的年青人在该院筹建起了内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农机系，后改名为农牧业机械系，现在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机电学院。我在这个系里工作了21个年头，直至1979年。那年为了整理我父亲潘光旦教授的遗著，我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开始查找父亲的遗稿。不久，费先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国大陆重建1952年时被中断的社会学学科，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建社会学研究所。我作为费先生的学术助手，于1980年调入社会学研究所，从此参与到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中来。1985年费先生转到北京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在北大创建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我也随着他调到北京大学，此后一直到他去世都在这里工作。

费先生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一直对内蒙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学学科建设问题十分关心，曾多次访问内蒙古。本文意在通过介绍费先生在内蒙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了解他对重建社会学学科和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视。

### 一、

社会学学科是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被取消的，其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这门学科源自西方，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被认为是一门资产阶级伪学科；二是当时的高校学科设置全面效仿苏联的体制，而那时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可以代替社会学，何况由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也就没有社会问题需要研究，社会学没用了。在1957年曾经有些学者提议“恢复社会学”，结果被打成“右派”，使这个学科一直中断了二十多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各条战线进行拨乱反正。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委托费孝通先生牵头来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这个学科才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获得了重建和发展的历史机遇。

当时费先生就明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这个学科不是个简单恢复的问题，而应当是一个重新创建的事业。我们既不应该仅仅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因为社会学的“出身不好”和“先天不足”，当时要在这种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加速培养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成为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费先生提出，为了发展这一学科，只能“知难而进”。针对上述情况，他在重建之初就明确地提出了用三句话来概括的指导方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sup>2</sup>这就是说，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过去社会学的所有成果和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同时应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践的考验

<sup>1</sup> 此文系作者2007年3月15日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sup>2</sup> 费孝通：“社会学学科建设与规划”，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86页。



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

在指导方针和目标明确后，费先生随即在国内社会学界开始了“五脏六腑”<sup>1</sup>的建设。“五脏六腑”是费先生对一个学科必备的核心组成部分的生动比喻，“五脏”是指一门学科的结构中应该包括五个部分：学会、研究所、大学里的系、图书资料中心、书刊出版部门；“六腑”是指要先准备好至少六门基本专业课程的师资和教材。费先生开列的六门参考科目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社会人类学）、西方社会学理论介绍。

1980年和1981年暑期，刚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了二期社会学讲习班，邀请了国内社会学老前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和美国匹茨堡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们来北京讲课。费先生自己也亲自参加了讲习班的组织和讲课活动。这两次讲习班培养了重建社会学学科的最早一批骨干。

最早筹建社会学专业或系的单位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和广州，在1980和1981年两个暑期讲习班结束后，我们又从这几个城市的大学中抽调了几位教师共同备课和编写社会学的入门教材，即《社会学概论》。在《概论》的前言中<sup>2</sup>，费先生希望教师们在试用这本教材时真正贯彻试讲的精神，如有不妥之处，应及时纠正和改进，并着重指出教师自己必须投身到社会调查工作中去，结合相应的理论研究，用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教材内容。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学科建设工作中的两条原则，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与此同时，为了加速学术人才的培养，我们采取了办专业班、办研究生班、选派人员出国培养等多种形式。

在积极推动“五脏六腑”的建设时，费先生也在考虑如何继续书写已经中断了多年的“两篇文章”，一是农村研究，二是民族研究。他在1981年三访江村后，从东部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开启了“小城镇研究”，开始了他的“行行重行行”。他带领师生和当地实地工作者一起，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从苏南开始，走遍江苏全省。

在80年代，他在各地考察“改革开放”下的社会变迁中接触和观察到两个现象：一是突然增加的人口流动，具体体现为三个流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内地农村众多“盲流”向边区流动、欠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向发达地区流动。二是沿海发达地区与边远的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扩大，这对国家整体的均衡和协调发展带来了冲击。根据以上观察，他提出了“全国一盘棋”<sup>3</sup>和“做好人口这盘棋的两只眼”<sup>4</sup>的看法。在具体的课题研究方面，他着手组织对黑龙江和内蒙古人口流动的研究，并开始了对甘肃定西的考察，开启了边区开发研究。1984年费先生把研究重点放到了“边区与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上，并决定从具有民族地区特点的内蒙古入手，以其为重点研究对象。

## 二、

自1982年至1995年这14年中，费先生先后11次来到内蒙古进行实地考察，这些考察活动主要集中在前5年里，其中呼和浩特6次、赤峰3次、包头2次、呼盟1次、伊盟1次、阿拉善盟1次、乌盟1次，而且有4次不同地点的考察是在同一次旅行中完成的。按内蒙古“南农北牧东林西铁”的分布特点，可以说他把内蒙古主要的典型地区都考察到了。他每到一处，除了接触当地政府领导和管理部门外，必到基层走访，或者召开科技人员和工人座谈会，或者入户与农民

<sup>1</sup>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见《费孝通文集》第八卷，287页。

<sup>2</sup> 费孝通：“《社会学概论》前言”，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64~169页。

<sup>3</sup> 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328~336页。

<sup>4</sup> 费孝通：“下好中国人口问题这盘棋”，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336页。



交谈。他的这些考察活动，有些是与民盟中央倡导的“智力支边”工作结合在一起的。

### 1. 六访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

1982年7月和1984年4月，费先生两次到呼市。他分别做了题为“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sup>1</sup>和“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sup>2</sup>的讲演。

在此期间，费先生特别关心并积极推动内蒙古社会学会的筹建工作，并提出了人口流动问题研究与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他指出对这两个专题的研究是为全面开展“开发边区”的社会学研究进行探索。面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发展大趋势，他认为要想走活中国人口这盘棋，需要做两个“眼”，即要有两条出路。一个“眼”是发展小城镇，把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池”，以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第二个“眼”是人口从中原向边区的扩散，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必然。<sup>3</sup>

在与内蒙古的研究人员讨论这两个问题时，他特别提出，我们不是研究应当如何移民，而是研究人口流动本身有什么规律？存在什么问题？各种形式的人口移动都会产生一些矛盾，应当观察、了解各类矛盾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研究如何使人口移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sup>4</sup>他还谈到我们在研究中面临两个差距，一个是别人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二是别人能得到的信息，我们收不到，信息的差距会导致研究质量的差距。

他特别强调要想发展经济和文化，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培养人，开发人的智力资源。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内蒙古地区，除了千方百计地引进新知识和新技术，还必须留住现有人才，注意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一定要把这批现有的智力资源用好，并培养出接班人。<sup>5</sup>在呼市期间，他还专门听取了民盟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关于高等教育、筹建青城大学和智力支边情况的汇报。

1984年10月初，在结束了第一次赤峰地区的考察之后，费先生专程到了一次呼市。10月5日清晨抵达呼市，当日上午即与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同志见面，围绕他在赤峰考察中所思考的有关经济发展、民族问题、东西交流等问题，与自治区领导同志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在自治区党政干部会上做了题为“从赤峰初步考察谈对边区开发的体会”的报告。周惠同志在与费先生三次见面后，曾表达了自己深受启发和感动的心情，他说费先生年纪大了，但思想活泼解放，不仅调查了农牧民现在的生产生活实际，还考了古，这种从古到今的历史研究和分析方法很好，写的文章和报告深入浅出，内中包含的道理很深，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很中肯。在这次访问中，费先生还专程到“干部大院”看望布赫、巴图巴根、克力更等自治区领导同志。

这次呼市之行，他还专门听取了内蒙人口移动问题研究课题组关于课题进展情况的汇报，考察了50年代从内地搬迁来呼市的机床附件厂。

1987年8月费先生随中央代表团到呼市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担任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多次座谈内蒙古的发展形势与前景。

在1985年6月和1990年10月，费先生先后两次到包头市考察，回程时都曾在呼市停留，并与自治区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其中前一次在干部会上做了报告，后一次是与自治区人大代表见面。

### 2. 一访乌兰察布盟

费先生在“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sup>6</sup>中曾经谈到，1982年7月在去内蒙古的路上，他看到很多人来当地淘金，据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外省流入此地的，他们淘金“发了财”，盖起了新

<sup>1</sup> 费孝通：“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见《费孝通文集》第八卷，399-40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sup>2</sup> 费孝通：“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316-341页。

<sup>3</sup> 费孝通：“下好中国人口问题这盘棋”，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336-339页。

<sup>4</sup> 费孝通：“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44-148页。

<sup>5</sup> 费孝通：“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316-341页。

<sup>6</sup> 费孝通：“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44-148页。





房子。此事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因此1984年4月他到呼市探讨和组织人口流动问题研究时，就安排了之后去乌盟金盆乡的考察。

在乌盟考察过程中，他听取了旗长、金盆乡干部和黄金公司负责人的汇报，又进行了实地访谈，同行的有内蒙古和黑龙江课题研究的负责人。边看边谈，这也是费先生言传身教的一个实例。

### 3. 三访赤峰地区

为了给费先生的赤峰考察做前期准备，我于1984年7月初至8月初访问了赤峰地区。我先在赤峰市有关部门拜访并索取资料，接着到翁牛特旗去了解情况，当时赶上—批离退休老干部回旗参观访问，我跟他们一起跑了近一个月，走了很多地方，又回到市里与市领导商妥费先生的具体考察方案。同年8月中旬，费先生开始了赤峰地区的实地考察。他说：“挑选赤峰为研究内蒙古开发问题的入门口，是因为在它的境内，具备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三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而且在民族结构上则和内蒙古总体一致，系蒙族和汉族等多民族杂居。”<sup>1</sup>

1984年8月15日至9月2日，费先生首次访问赤峰，考察路线从赤峰市太平地开始，随后为乌兰敖都——示范牧场——海日苏——短角牛场——巴林右旗大板镇——巴彦他拉草原站——翁牛特旗乌丹镇——巴汉他拉——黑塔子——山嘴子乡驿马吐村——桥头镇。最后再回到赤峰，全程1000公里，考察地点共34处。在考察后他写了两万多字的“赤峰篇”<sup>2</sup>，分析了由古至今农业与牧业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发展过程，指出在民族杂居地区，农牧矛盾一般也可能表现为民族矛盾。在文章中，他还总结了过去滥砍、滥牧、滥垦、滥采造成的林草俱尽、农牧双衰的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的教训，以及造林治沙、退农还牧、以农促牧、以牧促农的典型经验，认为只有提高牧业发展的生产力，才能根本扭转农牧矛盾，恢复生态环境，搞活经济。他认为“有工则富，无商不活”这句话也适用于赤峰地区。

费先生十分关心现有的好经验和行之有效的科学知识怎样能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上，变成千家万户的生产力；他说这里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形成一个扩散知识的社会组织，一是怎样建立起一个扩散知识的队伍。<sup>3</sup>他在考察了驿马吐科技村后，认为它的实验可能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答案。为此我在10月初随费先生到呼市后，又于10月下旬专程到驿马吐科技村做了半个月的专题调查。

1985年9月费先生二访赤峰。这次是在马戎完成了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喀拉沁旗和通辽两镇的“蒙汉杂居、农牧杂居地区人口迁移”问卷调查后，他专程来听取汇报的。马戎当时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这次调查研究从1985年6月开始至1985年9月完成，既是“边区开发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也是他学位论文的实地调查阶段。当时费先生被布朗大学社会学系聘为马戎的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答辩委员会成员，所以也是他在内蒙古进行实地调查的指导老师。

1995年7月费先生三访赤峰，与1984年的首访相隔了11年。在此期间，赤峰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他在考察后写的“三访赤峰”<sup>4</sup>一文中，就恢复生态、农牧结合、乡镇企业、发展前景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 4. 二访包头

1985年3月中至3月底，我与李汉林到呼、包二市有关部门搜集资料，为费先生访向包头做准备。6月中旬至6月底，费先生首访包头市，重点考察了包钢、包头一机厂、包头二机厂，还有早年从天津迁来的包头开关厂、由粗瓷作坊成长起来的包头耐火器材厂等。他分别与领导层、管理层、科技人员、研究人员、工人进行了座谈讨论，听取了各方面的看法和建议。

<sup>1</sup> 费孝通：“赤峰篇”，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489页。

<sup>2</sup> 费孝通：“赤峰篇”，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489~517页。

<sup>3</sup> 费孝通：“赤峰篇”，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510页。

<sup>4</sup> 费孝通：“三访赤峰”，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307~323页。



费先生在考察后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论文“包头篇”<sup>1</sup>，重点揭示了边区封闭式大型企业存在的人文生态失调的问题，提出了扭转这种人文生态恶性循环的看法，建议国家在边区发展的政策上，采取一些“保而不护”的特殊政策。同时要调整这一人文生态环境，需要把大型骨干企业的能量扩散出来，使之成为发展边区工业的发动机；在一个区域内扩散工业的同时，还要建设城市，发展小城镇，使之形成一个由大小企业构成的群落，一个有生长活力的社区。<sup>2</sup>

在考察结束后，他接着就在包头召开了“边区开发科研工作会议”，内蒙古、黑龙江、甘肃等地都有研究者参加。费先生作为会议的倡议人和课题的学术指导，在题为“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sup>3</sup>的发言中，首先回忆了这一课题产生的经过，说明为什么要在北方边区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调查研究，进一步以赤峰行和包头行为例介绍了研究方法，特别是如何破题的问题。他强调：“我主张理论工作者要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破了题，抓住有典型意义的专题，认真分析，解剖麻雀，取得了结果，再搞普查，取得定量的资料，这样的结果才有价值”。<sup>4</sup>他还表示寄希望于青年的一代。他说：“科研工作是十分艰苦的，是要吃苦的。我们年纪大的人没有条件深入下去做实地观察了，只有破题，帮助你们开一条路，希望你们扎扎实实地搞下去。”<sup>5</sup>

1990年10月，费先生再访包头，考察5年来当地的发展和变化。他在包头向当地领导和研究人员介绍了甘肃大企业的“一厂两制”和陕西宝鸡“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并围绕搞活大中企业和全国一盘棋，缩小东西差距这一主题，把这次考察的体会写成了“包头行”。<sup>6</sup>

## 5. 一访伊克昭盟

1985年6月在包头结束了“边区开发科研工作会议”之后，费先生访问了伊盟，请盟委、盟公署、盟政协和东胜市介绍了情况，还专门了解了当地民族教育情况和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发展状况，并到伊金霍洛旗拜谒了成吉思汗陵。

## 6. 重访呼伦贝尔盟

费先生在1950年代初期曾访问过呼盟，当时就写有“话说呼伦贝尔草原”<sup>7</sup>一文。1987年7月，费先生为“边区开发”课题的继续破题来到呼盟，他在海拉尔市走访了专业户和乡镇企业，考察了口岸城市满州里市。

这一次费先生关注的重点是林区经济和人口较少民族问题，因此利用了更多的时间走访了驻牙克石市的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和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聚居的自治旗或乡镇。他在“话说呼伦贝尔森林”<sup>8</sup>一文中提出了林业管理体制问题。他认为“改善林区经济状况，最根本的一条办法是开放多种经营，发展多种多样的小企业，个体、集体、全民一齐上。以小企业来保护大企业，使森林资源能持续利用，青山长在。”<sup>9</sup>

在“鄂伦春人的前途”一节中，费先生提出了一个“最严肃”的问题，即“一个民族脱离了生产，会不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呢？”<sup>10</sup>他在文章结束时强调，“大兴安岭林业的发展，必须考虑林区经济的全面开发，而在开发林区资源的过程中决不应忘记了原来居住在森林里的鄂伦春民族。我们不仅要保证青山长在，还应保证各民族共同繁荣。”<sup>11</sup>

<sup>1</sup> 费孝通：“包头篇”，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24~140页。

<sup>2</sup> 费孝通：“包头篇”，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24页。

<sup>3</sup> 费孝通：“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16~123页。

<sup>4</sup> 同上，119~120页。

<sup>5</sup> 同上，120页。

<sup>6</sup> 费孝通：“包头行”，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16~123页。

<sup>7</sup> 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草原”，见《费孝通文集》第六卷，417~450页。

<sup>8</sup> 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316~327页。

<sup>9</sup> 同上，324页。

<sup>10</sup> 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326页。

<sup>11</sup> 同上，327页。



## 7. 一访阿拉善盟

1988年7月，在民盟中央的建议下，在兰州召开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内蒙两省两区的部分地区）的新闻发布会，会后费先生专门到阿拉善盟考察，看了腰坝的人造绿洲、吉兰太盐湖，了解了骆驼养殖业的发展情况。他在阿拉善盟干部座谈会上介绍了这几年在边区考察的体会和建设“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特别提出了当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地区民族经济特点的问题。

他在“访骆驼之乡”<sup>1</sup>一文深情地说：“你们始终不要忘记在实现牧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实现蒙古族现代化。……要把这里的蒙族建立在现代化牧业的经济基础之上，要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阿盟的蒙族牧民可以把养骆驼、山羊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优势。”<sup>2</sup>

### 三、

学科重建以来，从1982年费先生第一次到内蒙至今已25年，最后一次距今也13年了。今天回忆起他在“边区开发”从内蒙方面入手所做的工作，在历次实地考察中所提出的问题，再想想他在七十多岁的高龄，对一个自己并不熟悉、条件又艰苦的地方，花这样大的心血和精力，一次又一次地去实地调查，为的是什么？任何科研工作都离不开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年轻一代既学会做学问也学会做人。学术工作毕竟不是行政工作，所以他自己在完成了“搭戏台”的任务后，尽快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工作上，并且是身体力行，力图做到言传身教，实践“从实求知”的目标。即使因高龄身体条件受到限制，他也认为自己要做好“破题”、“开路”的工作，为年青一代铺路、搭桥。

#### 1. 重视学科建设的基础

在充分估计了重建任务的复杂和艰巨后，他希望尽可能打好学科建设的基础。费先生自己一生努力追求的，就是用自己学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但是在当时学科恢复的过程中，社会学人才极其缺乏，又需要马上建立一批研究所和大学的社会学系，为此不得不采取“速成”培训的方法。他非常清楚“速成”的弊病，指出在当时的形势下，学科“重建时又不得不用‘速成’的方法。因此基础不够扎实和深厚也就难于避免了。”<sup>3</sup>

同时他也特别强调，在基础不牢靠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现他已预先估计到的两种倾向：一是把学科“庸俗化”（指忽视学科基本训练和学术规范）；二是学科“中心外倾”（主要指“食洋不化”，被国外牵着走）。<sup>4</sup>这些问题，费先生在学科重建初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在内蒙古考察时又多次告诫我们。通过他在内蒙考察时的言传身教和我们自己的调查实践，我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费先生的苦心，直至今日也不可忽视这些问题，对之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 2. 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要想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做好科学研究工作，用科研成果来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这就是费先生一贯倡导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贯彻得好，自然就能够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费先生说自然科学研究靠实验室，而调查基地就是我们的社会实验室；要建设和利用好这些实验室，虽然它们不能固定，但可做到相对稳定，并有一定的延续性，既有利于追踪研究，也方便做比较研究。

自费先生在内蒙进行了系列考察活动，并为“边区开发”课题进行了破题工作后，结合他主

<sup>1</sup> 费孝通：“访骆驼之乡”，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360~369页。

<sup>2</sup> 同上，368页。

<sup>3</sup>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57页，群言出版社，2001年。

<sup>4</sup>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06~107页。





持的“七五”国家重点课题“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和“八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研究所内其他人员负责的课题，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又在内蒙组织过6次实地调查，其中赤峰地区4次、呼盟2次，另外还有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陕西、云南、四川、湖北等省区的若干少数民族社区调查。

这些课题的调查活动都在费先生的学术指导下进行，也结合了青年教师、博士后和研究生、本科生的培养工作，特别注意实践了费先生强调的典型个案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费先生在包头召开的“边区开发科学研究工作会”上明确表示：“我到北大去建社会学研究所，主要是想与社会学系配合，本着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精神，在工作和研究实践中，培养一批既有社会学理论水平，又能做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工作者。这实际上也是师资培养的工作。我们老一代总是希望为培养年轻一代再多做点工作，多出一把力。”<sup>1</sup>

费先生在“七五”国家重点课题成果《边区开发论著》<sup>2</sup>的前言“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sup>3</sup>中，特别谈到他作为课题学术指导者的任务，并表示通过这些项目的研究工作“实现了我们培养年轻一代教学研究人员立足本国、联系实际、深入基层做调查工作的愿望。”<sup>4</sup>

### 3. “学以致用”、“志在富民”

这是费先生学术工作的一贯主张和追求，要想做到这点，要有超前研究的意识，并善于提出问题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回顾费先生关于“边区开发”研究的设想和他在内蒙的调查研究工作，可以看到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老百姓“民生”着想的生动范例。其影响的范围和深度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

首先就内蒙而言，费先生每到一地考察都发表讲话或写文章，回京后还参加过“内蒙发展战略研讨会”，先后发表了“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sup>5</sup>和“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sup>6</sup>两文。他说，“我们的民族工作就是要实现共同繁荣和民族平等，出现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民族团结局面。团结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民族矛盾的产生根本出于经济的原因。”<sup>7</sup>因此“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首先是要搞清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情况。摸清情况必须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实际的处境，利用本民族和本地区的优势，选择突破口，做出有实效的榜样，来启发群众的积极性，循序以进，由点及面，由小到大地把能使千家万户富起来的办法推广开来，取得成效。”<sup>8</sup>他憧憬内蒙古发挥边区优势，从采掘工业和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入手，走出一条农牧结合、城乡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边区开发的道路来。

其次，就更大范围的民族工作来看，费先生在前述“七五”国家重点课题完成时写过两篇总结归纳性的长文，一是前述“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作为课题成果的前言，二是“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sup>9</sup>。他在后文中归纳了自1984年以来共8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对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产生的一些观点和设想，并就边区的两个失调、西部的发展战略构想、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特长和优势、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民族的现代化五个方面发表了意见。

他明确提出：“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把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妥善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

<sup>1</sup> 费孝通：“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22~123页。

<sup>2</sup> 潘乃谷、马戎主编：《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sup>3</sup> 亦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317~334页。

<sup>4</sup> 同上，318页。

<sup>5</sup> 费孝通：“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12~115页。

<sup>6</sup> 费孝通：“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226~229页。

<sup>7</sup> 费孝通：“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12页。

<sup>8</sup> 费孝通：“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226页。

<sup>9</sup> 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361~370页。



使之同全国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所走的是共同繁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sup>1</sup>此后费先生还就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出过建议，接着由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三家联合组织了调查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国家民委以这一调查报告为基础，向国务院提交了“十五”规划民族工作的方案。这一报告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22个人口在10万以下民族的发展问题提到了“十五”规划的具体方案中，使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国家的资助和支持。

最后，就全国范围看，费先生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里，明确提出：“东西部协调发展还要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方针来推动。地区间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关键是深化改革。……这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在改革中找出路，求发展。”<sup>2</sup>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实践中证明了费先生的科研工作所具有的预见性。

#### 4. 跟上时代，赶紧补课

进入90年代后，我国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也不断深入，国家发展的形势对学科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费先生一方面继续进行实地考察，把从江苏开始的城乡研究和内蒙入手的边区开发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区域研究；另一方面，自1993年开始，费先生对自己进行了学术反思。

费先生表示，他要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这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的“文化自觉”。他说：“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说的，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到一门学科的演变。”<sup>3</sup>1998年他又及时提出了“补课”的要求，并身体力行，在近两年时间里，完成了7万字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sup>4</sup>

他反复强调的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还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补课必须补，要追上新的变化，追不上是要被淘汰的。建设学科要看大一点，看远点，学者不能走官场的路子，学术需要基地，培养一批人，如果‘学而优则仕’，那么也就不会优了。当一个学者，要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1998年3月31日 潘乃谷工作笔记]“学者要有知识，要有学识。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面，是他一生唯一的任务。”<sup>5</sup>年轻一代要“善于利用各种条件来充实和发展自己，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需要补什么补什么，但大目标要抓住不放，目的要清楚。”<sup>6</sup>“看书也要看到骨子里去，自己看清方向，定出目标，靠自己钻研、磨炼，必须把国学和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向文化自觉的方向努力。这是人人可做，大家都有份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可以从中认识世界，以小看大，以一点看宇宙。派克成为社会学家的路子是人人可学的。”<sup>7</sup>

二十多年过去了，重温费先生在内蒙古的调查研究工作，虽然只是他学术工作中一个小小的部分，但是我们从中不但看到了他“行行重行行”的身影，而且再次感受到他对学科重建的重视和对人才培养的关切。老一代学者为学科发展打下了基础，也指明了发展的路子。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以前好了，我们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关键是在团结一致，要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个青年总得有点革命精神和事业心，千万不要把个人放在前面。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新的一代的一个严峻考验：没有一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无名英雄，任何事业都是搞不成的。”<sup>8</sup>

<sup>1</sup> 同上，369页。

<sup>2</sup> 费孝通：“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331~332页。

<sup>3</sup>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371页。

<sup>4</sup> 费孝通：“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133~234页。

<sup>5</sup> 费孝通：“爱国学者一代人”，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27页。

<sup>6</sup>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62页。

<sup>7</sup>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61页。

<sup>8</sup>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见《费孝通文集》第八卷，288页。

